

资本的国际化与南北问题

——跨国公司的世界性集中、集聚运动

(日) 中川信义 著 张开玖 译

原载：日本《经济》月刊 2003 年 7 月号

一、引言

想必各位读者都看过 NHK (日本) 3 月 30 日的专题《全球市场, 财富的攻防》的第 3 集《要塞镇的人们——美国竞争社会的得胜者们》。所谓的“要塞镇”, 是由高墙和铁门所围成, 居住有大约 800 万人的超高级住宅区, 正如镇外一个居民所说的那样, “有钱人住那儿, 其他的大部分人住这边, 铁门的内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全美共有 2 万多个此种住宅区。这让我想起了南非曾有的种族隔离的类似住宅区。这一节目是以其中一个此种住宅区, 即位于洛杉矶以南 100 公里, 拥有 4000 套高级住宅和两个高尔夫球场的全美规模最大的“要塞镇”为舞台, 从“全球市场, 财富的攻防”的观点来制作的。只有那些在 1990 年代美国泡沫经济当中得胜而幸存下来的从事 IT (信息技术) 产业的人士或就职于投资银行的商业人士、银行职员、合资企业的经营者们才够资格住在这里。这一节目在介绍完用“winner take all” (胜者获得一切)、“胜利的代价”、“不安与焦躁”等语言体现出来的镇上居民的生活之后, 如下的解说员的最后的台词颇具象征性意味:

“产生一小部分的少数的得胜者和大量的失败者的美国竞争主义, 现在正在波及到全球的市场。”

以下的本稿, 将在第一部分的“资本的国际化与 21 世纪开发帝国主义论”当中, 论述将针对“开发帝国主义论”, 特别是在中国首先发生的“内生发展论”而展开; 在第二部分, 即在论述“南北问题与亚洲经济”中, 将介绍“亚洲新工业化”论, 并提出 (也可以称得上是其结论的) 对从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到亚洲共同市场的展望; 在第三部分, 关于跨国公司的运动规律方面, 将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来介绍资本主义积累的运动规律, 同时也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来介绍世界积累论, 并借助实例, 弄清汽车跨国公司以及 IT (信息技术)、ICT (信息、通讯技术) 跨国公司的世界性集中、积累的实态。

首先, 我们来看从联合国贸易开发会议《世界投资白书 2002 年》中整理出来的表 1《2002 年的最大的跨国公司与各国国民经济的比较》, 以此来着手进行比较。虽然从这一比较表中, 也正如制表者本身所认为的那样, 将附加值和 GDP 作对比, “在概念上有很大的缺陷”, 但是, 撇开这一点而言, 即使是 30 年前的 1970 年的情形也能作个比较。

从表 1 可发现, 到 2000 年为止, 进入前 50 名的跨国公司有列在超雄之首的第 45 名的美国埃克森莫比尔和美国/美德汽车的排名在第 47 名的美国 GM 两家。而第 51 名以下的有第 55 名的福特、第 56 名的戴姆勒-克莱斯勒、58 名的美国 GE、59 名的丰田等共 27 家, 而在此排名内的国民经济实体则占了 23 个。

表 2 是 30 年前的 1970 年的各国 GNP 与跨国公司的销售额的比较表。进入前 50 名的跨国公司有 23 名的美国 GM、27 名的美国美孚石油 (现在的埃克森莫比尔)、29 名的美国福特、36 名的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43 名的美国 GE、45 名的美国 IBM、47 名的美国莫比尔石油 (也是现在的埃克森莫比尔)、48 名的美国克莱斯勒 (现在的戴姆勒-克莱斯勒)、49

名的尤尼莱佛等 9 家,而在此排名内的国民经济实体则占了 41 个。不过,从 51 名到 99 名中,跨国公司竟然占了 31 家,而在此排名内的国民经济实体则仅占了 18 个。比较一下这两个表,可以窥探出苏联的瓦解与旧领土的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国的这一时期的腾飞、以及跨国公司的变迁(丰田、日立、松下、三井、索尼等日本跨国公司及 IT 跨国公司的发展)等世界情形变化的影响。

二、资本的国际化与 21 世纪开发帝国主义论

(一) 资本国际化的定义

所谓资本的资本国际化(Capital Globalism),是指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国际化,其内在实质是跨国公司或跨国银行的对外活动。根据前面提到的《全球投资白皮书 2002 年》的例年统计表《2000 年非金融行业对外资产世界前 100 名跨国公司》表,在 IT 或 ICT 等行业的跨国公司当中,到前年为止,就连前 100 名都未进入的英国电信的沃德丰跃到了第一位,美国 GE 排在第 2 位,第 3 位是超雄的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莫比尔、第 5 位是美国的 GM 汽车、第 6 位是英荷皇家壳牌石油公司、第 7 位是英国石油公司、第 8 位是丰田、第 9 位是西班牙电信的 Telefonica、第 10 位是意大利的菲亚特、第 11 位是美国的 IBM、第 12 位是德国的大众、第 16 位是德美的戴姆勒-克莱斯勒、第 18 位是瑞士的雀巢公司,第 21 位是德国汽车的宝马公司、第 22 位是索尼、第 25 位是荷兰的飞利浦、第 28 位是美国的沃尔玛、第 29 位是本田等大的跨国公司都纷纷登场。IT 或 ICT 行业的跨国公司有 17 家之多,有 11 家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连同 9 家的石油及制药行业等的跨国公司,独占跨国公司产业界的鳌头。

但是,在此,跨国公司的排名等等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必须找出这些跨国公司激进发展的原因。其最大的原因在于跨国界的跨国企业的合并、收购。表 3 即是 1987—2001 年按金额排名的 20 大跨国公司。第 1 名是方才提到的英国电信的沃德丰,第 2 名是超雄的英国石油公司。第 3 名是有美国克莱斯勒参与收购的德国戴姆勒-奔驰。根据此表,前 10 名的有 595 件合并、收购、总计 7,139 亿美元,前 20 名有 1,370 件合并、收购、总计 9,377 亿美元,金额最大的是 Vodafone,件数最多的是 GE。

为了论及南北问题,特别是亚洲经济论以及“亚洲新工业化”的问题,在这里,先来看在成为“intro-Asia 贸易”(亚洲区域内或亚洲贸易)的主力担当手,并在“亚洲区域内直接投资”(同直接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丰田、索尼、本田、松下等“日本型跨国公司”^① [1] 在现阶段的特性(其他有“韩国型跨国公司”、“亚洲四小龙企业”、“华人、华侨资本”等类型)。

首先,关于“日本型跨国公司”的“日本型”,从把“日本型”首先解释为“后发型”的左藤定幸氏开始,接着有林直道氏和笔者都将“海外生产比例”的低下看作是跨国公司的落伍,继而佐佐木建氏、一之濑秀文氏、北田芳治氏等从其他各种论据出发来定义和探讨了

① 佐藤顶幸《〈日本企业的跨国公司化的可能性与界限〉》(跨国公司研究所编著《〈日本化的跨国公司论的展开〉》法律文化社,1997年)、林直道/中川信义《〈日本资本主义在现代帝国主义体制中的地位〉》(收录于林杉本昭七编《〈讲座.今天的日本资本主义 第1卷〉》,大月书店,1981年)、佐佐木建《〈日本型跨国公司——从贸易摩擦到投资摩擦〉》有斐阁,1986年、一之濑秀文《〈日本型跨国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基础——出口指向型积累型的构筑与破绽〉》(收录于林直道编著《〈现代资本主义论集〉》青木书店,1994年)、北田芳治《〈跨国公司〉》(渡边治编《〈现代日本社会论〉》劳动旬报社,1996年所收录)、渡边治《〈〈讲座〉现代日本① 现代日本的帝国主义化 形成与构造〉》大月书店,1996年,参考。另外,关于“韩国型跨国公司”,高龙秀“韩国跨国公司与 intro、亚洲贸易”(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川信义编《〈intro、亚洲贸易与新工业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所收)以及同《〈韩国的经济体系——国际资本转移的扩大与构造改革的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2000年,参考。

“日本型”。最后，到提出最新定义的渡边治氏，他们对“日本型”的探讨产生了可谓是跨国公司的“日本型”论的理论体系。

在此，来分析一下将理论最精致地展开的渡边治氏的学说。渡边氏主要以北田氏的理论为依据，论述道，“日本企业由于其‘出口志向’的特性，在从出口转换到国际生产（海外生产、以下同），并确实地进入跨国公司的发展阶段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列举了以下各种特征。第一，日本跨国公司进军海外与美英相比自不待说，即使是与德国相比，也开始落后一大截，拉开了大幅度的距离。第二，其进军目的地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这是日本跨国公司的一大特色。第三，尽管在日本的跨国公司企业已确实地向海外发展之后，其“出口志向”的体质还是不容易消除，产生了“日本企业社会”的冲动、顽固的自由贸易志向、企业的大裁员以及“空洞化”等各种各样的“日本特征”。

以上，对所谓的“日本型”的分析是指以“后发型”或者较低的“海外生产率”，“出口依赖型”、“出口志向型”为特征的，而较低的“海外生产率”或较高的“出口依赖率/依赖度”，则是同一特征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至于面向东亚、东南亚的直接投资这一特征，特别是对于作为 20、21 世纪转换期的“世界工厂”或“世界市场”的中国的投资，现在与其说是跨国公司的落伍，不如称其为先进性、Location（地理的或地政学的）的优越性。

表 4 是 1996 年、2001 年日本跨国公司中的对 30 大公司的①销售额、②母公司的出口、③海外直接投资以及④国际生产（海外生产）的比较。排在第 1 位的丰田，显示了在日本经济低迷的极端时日本跨国公司的跃进的情形，从 1996 年到 2001 年，丰田的出口比例和生产率都有明显上升，出口比例从 26% 上升至 31%，国际生产率从 19% 上升至 57%。第 2 位的索尼 1996 年、2001 年分别为 27%/20%、27%/20%，没有发生变化；第 4 位的松下为 1996 年（21%/14%）、2001 年（20%/29%），有所上升。特别是丰田的国际生产率为 57%，仅次于雅玛哈汽车的 67%，超过 50% 的还有松田（55.8%）、富士胶卷（54.5%），总共 4 家。

不过，日本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更加促使了“日本型企业社会”的发展的矛盾、促使被称为“企业大裁员”的解雇、促使壮年期“过度疲劳死”以及“日本经济空洞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最终导致日本农业的破灭，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结构解体，可以说，现在日本经济的重建任务落在了残留（不向海外发展或者不可能向海外发展的）中小企业的肩上。

（二）“21 世纪开发帝国主义论”与“内生发展论”

笔者曾经在“发达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动向——美国、西德、日本”当中进行了论述：预见 1970 年之后，面对被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主张上的“资源国家主义”的高涨，跨国公司以资源开发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将逐渐被关闭起来、直接投资将会集中于制造业。“21 世纪开发帝国主义论”^①就受到上述推测的影响。该理论的分析认为，在 21 世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拉丁美洲各国，将会接受在汽车、IT 或 ICT 产业、家电、工程机械及其他领域的跨国公司的从外面来的开发。若是这样的话，不得不让我们提出疑问：所以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是否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国？图 1 即可回答上述疑问，这是英国的约翰邓宁(J.H.Dunning)作出的“投资发展轨道模式”的图。

“投资发展轨道模式”图中，纵轴是 NIO（纯投资——流出——流入），横轴是以 GNP 为标准，将其分为 5 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模式图描绘了任何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in)，

① 拙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动向——美国、西德、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机关报 22]，日本评论社，1973 年所收）、拙稿《亚洲新工业化》与《21 世纪亚洲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学会编《亚洲新工业化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学会年报第 34 集]青木书店，1997 年，所收，23 页）、参考。

流入 (outflow) 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都会沿着某种程度上已经定规的发展轨道。第 III 阶段包括了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 及东盟的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 第 IV 阶段则包括了是台湾地区和韩国。

图 2 是从 1985 年以后韩国及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金额来看, 台湾和韩国分别于 1987 年和 1990 年从“吸收资本方”转变到“出资方”, 进入了图 1 的 IV 阶段。

那么, 对于 2002 年最终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吸引外资国的中国, 我们从“出资方”和“吸引外资方”的两方面来看一看。

首先, 关于作为“出资方”的中国, 如表 5 所示, 2001 年以对外资产分类的中国跨国公司的排名中, 有 2 家运输公司、2 家石油公司、2 家建设公司、3 家贸易公司、2 家钢铁公司、1 家家电公司 (01 年 1 月与三洋有限合作而驰名的第 11 名海尔集团) 和 1 家通信机械公司。

接下来, 关于作为“吸引外资方”的中国, 以表 6 来表示在中国的主要的跨国公司相关公司 (子公司) 的出口贡献率的排名。实际上, 这张表只显示了 85 家公司当中的前 10 名的相关公司 (子公司)。第 1 位的三星电子在东莞的 1 家、天津的 4 家共 5 家子公司的出口额 14 亿 9,100 万美元,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0.53%。第 2 位的 IBM、3 位的诺基亚、4 位的摩托罗拉、5 位的 Seagate Technology、6 位的精工爱普森、7 位的飞利浦等 85 家公司共出口 265 亿美元, 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9.48%。

与这个“21 世纪开发帝国主义论”对立的是发生于中国的“内生发展论”。前者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开发、成长论”, 其特征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及“大量废弃”。与此相对, 后者是中国社会学会的第一任会长的费孝通博士所提倡的有名的“苏南模式之一”、“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之二”及“珠江模式”的从内部来探讨的“开发、发展论”。

说费孝通博士也许大家不是很熟悉, 他战前在伦敦大学的波兰籍英国人教授 B. Malinowski 的指导下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 是一位因调查中国农民和云南少数民族的情况 (论著有战前的《中国农民的生活》[1939 年, 英文]、战后的《在平等立场上的统一——中国少数民族的进步》[1977 年, 英文]等) 而出名的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社会学者, 曾出任 1980 年创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

据首次将这位费孝通博士介绍到我国的鹤见和子氏的记载, 1979 年 4 月他访问中国时, 费博士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 (少数民族) 是自己解放自己的, 不是我们解放他们的。相互平等相处, 从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出发, 走不同的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正好和第三世界人民沿不同道路来进入和发展现代化一样。”^①

对于中国的“内生发展论”的提倡者,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论述中文如其人的。这种“内生发展论”是与内外的实证事例研究相关的。例如, 关于中国方面的有宇野重昭、鹤见编的《内部发展与外向发展》, 关于亚洲方面的 (泰国、斯里兰卡、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 有西川润编的《亚洲的内部发展》, 关于日本方面的有保母武彦的《内生发展论与日本的边远山村》^②等。图 3 表示了中国的“内生发展论”, 图中显示了上海、宁波间的海上大桥构想和杭州、宁波以及“温州模式”的温州在中国的地理位置。

有关费孝通博士的四种“模式”当中的因“三把刀” (携刀的三种职业的人——厨师、理

①鹤见和子《内生发展论的展开》(筑摩书房, 1996 年, 34 页) 参考。

②宇野重昭. 鹤见编《内部发展与外向发展——现代中国的交错》(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4 年)、西川润编《亚洲的内部发展》(藤原书店, 2001 年)、保母武彦《内生发展论与日本边远山村》(岩波书店, 1996 年)、参考。

发师、裁缝师)而出名的“温州模式”的报道,以“大上海——发展的源泉 上下”为题刊登在《〈日本经济新闻〉》(2003年1月19、20日)上。根据这篇报道,温州市的共产党常务委员断言:“不需要依赖外资,自力更生也能充分发展。”温州机场的建设打破了私营企业不能投资主要基础设施的规定,成为首个由私营企业投资建设的机场。1997年开通的铁路从与温州并列的浙江商人的据点宁波出发,跨越杭州湾、到达上海的跨海大桥于2003年也开始建设。中国加入WTO、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内生发展论”,使“亚洲共同市场”的形成具备了条件。

在这里所讲的“亚洲共同市场”或“亚洲共同体”,是指对与“失去的十年”、“1997年的IMF危机”等20世纪末,日本与韩国等的一国再生产结构解体的危机发生的同时与之并存的21世纪初开始的“亚洲间(Intro-Asia)贸易、直接投资”结构的发展,以及对亚洲规模的国际再生产结构的形成的展望。关于这一21世纪的展望,有伦敦大学名誉教授森鸠通夫氏的《〈亚洲新干线共同体〉》和作者的《〈亚洲IT共同体〉》^①,成了亚洲经济论者最主要的关注点。另外还有个问题,即关于“亚洲共同市场”特别是“亚洲IT共同体”的技术者特别是IT技术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大学的A.Saxenian教授说过,支撑着美国硅谷的,不是半导体的IC(Integrated Circuit),而是“印度人与中国人”的IC(Indian & Chinese)。在此不赘述^②。

中国未被卷入2003年3月末开始的美英对伊拉克的攻击,如果经济继续发展下去,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20年、30年或50后,即到21世纪中叶,“亚洲共同市场”或“亚洲共同体”将会形成。

三、南北问题与亚洲经济

(一) 南北问题与亚洲新工业化

资本主义的南北问题,正如我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为机关报发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尾崎彦朔、奥村茂次编的《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机关报 26]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笔者执笔的“拉丁美洲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业支配、外资政策”)、以及奥村茂次、山崎春成编的《现代世界经济与新兴工业国家》([机关报 32],同出版社,1983年,同样从《新兴工业国家的吸引外资——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债务》)等等,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一般是以“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为题来进行论述的。将亚洲经济问题看作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问题,也是行得通的。

从同样的意识问题出发,以拉丁美洲的“低开发的发展”、“从属论”而出名的G.Frank,最近在他的《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藤原书店、2000年,原著为1998年出版)中指出,南北问题的解决的一个方法,是寻求亚洲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新兴工业国家、地区,还有新兴工业经济群)的发展。但是, Frank的观点有诸多事实认识上的错误(比如说,“日本没有封建制”之类的令日本中近世史家震惊的观点),不能轻易附和。然而,笔者等等国际经济研究组的“亚洲新工业化”论^③找到的方法却不是“解决”南北问题这一问题(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的。可以参考的比如M.Chosdovskij的《贫困的世界化[国际化]——IMF与世界银行带来的结构调整的冲击》,郭洋春译,柘植书房新社,

①中川信义、村田武对话“加入WTO与亚洲经济”本杂志2002年2月号,参考。

②同上。

③关于“亚洲新工业化”,参考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川信义编《亚洲新工业化与日美经济》、同编《亚洲·北美经济圈与新工业化》、同编《Intro 亚洲贸易与新工业化》(全部为东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994年、以及1997年所出版)。

1999年),而是“解体”南北问题要从亚洲经济发展的方向去考虑。

这里很难能称为是南北问题的“解决”,但是其“解体”的方向之一,是又由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东盟,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特别是“亚洲新工业化”的发展所提供的。接下来就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亚洲新工业化”。

第一,关于“亚洲新工业化”的时期划分以及范围——初始期划为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这样规定的原因是韩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崛起以后,这一巨大的发展浪潮波及到了东盟、中国、越南、印度等国家;终止期划为2020年,这是因为2020年是APEC、ASEM(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EU的首脑会议)决定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预定期限。此外,其地理范围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韩国开始,到80年代的东盟、中国以及90年代的印度。

第二,关于“亚洲新工业化”的“周边性以及后发性的利益”——对于中川敬一郎、大河内晓男以及中冈哲郎诸位^①关于A. Gerschenkron的“后发性的利益”的介绍或批评,笔者也进行过讨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突然性的大跃进”的这一观点。但是这只不过是单以先发、后发的时间轴为中心的一种构想。与此相对的“周边性的利益”不只考虑到时间轴,是连空间轴一起考察的一种构想。特别是以日本为“中心”和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周边”,进而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为“半中心=半周边”和以东盟、中国等为“周边”的时间轴、空间轴连锁的历史性的模式的设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关于“亚洲新工业化”的担当者——与18、19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旨在确立产业革命和产业资本的“旧工业化”不同,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亚洲新工业化”的担当者是国家与跨国公司、地方(local)企业(比如韩国的财阀、中国的国有、国营、私营企业等等)所结成的所谓的“三者同盟”^②的三者,这是亚洲新工业化的特征之一。与同样是“三者同盟”的跨国公司主导的拉丁美洲型不同,从韩国、台湾等“开发独裁”可以体现出来的典型的国家主导的亚洲型,是“亚洲新工业化”的历史性的特征。

(二) 从亚洲自由贸易协定到亚洲共同市场

1994年笔者曾指出,“亚洲经济圈”是两层结构,也即是不以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条约(EU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基础,而是以在亚洲规模中的日本跨国公司为基础的。第一层是实际企业内的国际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企业内国际贸易,第二层是“中国、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为基础的^③。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看成是“亚洲经济圈”的第二层结构的发展,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四波。

① 关于“后发性的利益”,参考中川敬一郎的《比较经营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大河内晓男编《经营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中冈哲郎编《技术形成的国际比较——工业化的社会能力》(筑摩书房,1990年)。

② 关于“三者同盟”,有可以参考H·Bravi的论文(杂志《New Left Review》1971年7、8月号之《后殖民社会的国家》)。该论文论及,对于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无法掌握国家政权,军部通过军事政变代行职权,官僚从政的后殖民社会的三个所有者阶级,即土著资产阶级、新殖民地主义的大城市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等等三者都不能专心地支配国家机器的“军部=官僚寡头制”,论文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性质定义。以此为先驱,参照“从属性的发展,是国际资本与当地资本的联合或者由于同盟而具备特征的从属的某一特殊阶段。国家如果作为活跃的伙伴参与同盟的话,三者同盟将成为从属性的发展出现的基本原因”的著作(Evans, Peter,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32)。

③ 参照拙稿《日本经济与亚洲、北美经济圈》(收于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川信义编《亚洲·北美经济圈与新工业化》)。

要分析“改革开放”的话，第一波是 1978 年末从广东、福建的开放开始的“华南经济圈”的形成，这一地区由于靠近香港、澳门，吸引华人、华侨的投资被寄予了厚望。第二波是 1985 年 2 月推出的三个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圈”、“闽南[厦门、漳州、泉州]金三角”、“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先是吸引日本投资、而后是吸引台湾、韩国企业的投资被寄予了厚望。这一波末后经过了“天安门事件”、“南巡讲话”达到了第三波的“环渤海经济圈”（北京、天津、大连）的形成，这一波比第一、第二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汽车和电子技术以及其他领域的日美欧韩台的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奔流似地大量涌入。中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第四波，这可以看做是与“亚洲经济圈”的实质性的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认为，21 世纪是亚洲特别是中国的世纪。2001 年 11 月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后，赶在日本、韩国的前面，开始突然进行了同东盟签定自由贸易协定的一系列活动。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中国开始朝着取代日本、韩国，成为亚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的核心轴的方向迈进。

关于中国，在我国“悲观论”和“乐观论”交错并存。笔者确信，这种场合的判断或者是理论基准应该是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评价。其中必须回答的第一点，“市场经济”是什么？第二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否是势不两立的？这两个新的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以商品、货币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交换经济”，有必要追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成立之前的 18 世纪末的英国的两个理论：创立了最初的经济学体系即“经济的原理”的 James Steuart 的“市场经济”论和制成完成社会性分工的商业社会展示图的 A. 史密斯的“市场经济”论。日本在 James Steuart 和史密斯的两学说研究上的泰斗小林升教授的东京大学时的友人，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朱绍文先生的研究组已经在中国开始了对两学说的讨论。

第二，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并存的可能性的问题，“市场经济”或者是“交换经济”或多或少是和“原始共同体”、“东洋专制主义”、或者“东洋总体的奴律制”（将 *allgemeine Sklaverei* 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变成奴律的体制）内部（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共同体之间发生了交换）以外的“古典古代奴律制”（在希腊和罗马世界，将由于战争或债务而把从共同体中被分离出来的成员变成奴律的体制）、“中世封建制”、“近代资本主义”、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等所有的“生产样式”是结合一起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未来的“亚洲共同市场”以及“亚洲共同体”将会成为两端象日本那样的经常引起泡沫经济和经济不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象中国、越南那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间为韩国那样的“民主的经济”、“社会的市场经济”（旧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就是那种模式）等各种“市场经济”并立、并相互竞争的体制。

以在前三册的机关报 39、43 以及 46 期（1990 年、1994 年以及 1997 年）所提倡的亚洲新工业化论、亚洲规模的国际再生产结构的形成以及作为基准水平的市场经济的这三个命题为基础，笔者认为，从 21 世纪初的中国和韩国，还有东盟等呼吁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开始，到 21 世纪中叶“亚洲共同市场”（Asian Common Market）以及“亚洲共同体”（Asian Communities）的形成，是可以展望的。

三、跨国公司的运行规律，即世界性的集中、集聚的运行规律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全三部以及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跨国公司论

毋庸置疑，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直接涉及跨国公司论。但是，虽然是跨国公司。只要是个别资本，其运行就必然要遵循资本主义积累的运行规律。那么，资本主义积累的运行规律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全三部的核心部分（积累论的三个关联契机）对运行规律进行了如下详细的阐述^①。第一部分，即第1部第7篇第23章的“资本的积累的一般规律”阐明了资本的积累过程特别是相对的过剩人口的递增；第二部分，即第2部第3篇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以及流通”阐明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以及流通、列宁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的第I部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相对第II部门（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优先发展的规律^②被称为是这一部分的创造性的发展；还有第三部分，即第3部第3篇第15章的“这一规律的内部性的各个矛盾的展开”，阐明了由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度化所带来的利润率的倾向性的低下的规律、特别是阐明了周期性的恐慌的深层次的根据。这三个社会总资本的规律贯穿于第1部第7篇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性倾向”中。并且，这一“历史性的倾向”的归结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积聚史（劳动力以及生产资料）来解读。

关于集中、集聚及其各自的作用，马克思理论与恩格斯的解释之间有出入，这已经为我国的经济学者们所指出^③。

如果从《资本论》的第1部第7篇第23章的“资本的积累的一般规律”、同上第3部第3篇的“利润率的倾向性的低下的规律”、同上第5篇第27章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信用的作用”、以及同上第1部第7篇第24章第7节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性倾向”当中，将集中、积聚特别是集中运动方面进行简单的排序，会得到如下结果。集中的两大杆杠是竞争与信用，根据第一位的竞争，大资本一般会压倒小资本。即进行着大资本对小资本的集中、吸收、吞并以及资本的剥夺等等。还有，根据第二位的信用，进行着各种资本的集中、资本对资本的吸收、资本结合（自身资本加上他人的资本）、资本融合、股份公司的设立等等、促进生产资料向大资本的集中。

但是，在此，如果要理解一国内的集中、集聚和世界性的集中、集聚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在理论上首次涉及这个问题的列宁的“世界性的积累”论进行讨论。列宁的“世界性的积累”论可以在《帝国主义论》特别是第五章的“资本家集团之间的世界性的分割”中找到，其内容如下：

“资本主义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创造了世界性市场。并且，随着资本输出的增加……最大的垄断集团的……‘势力范围’的扩大……垄断集团之间已经接近了世界性的协定，也即接近了国际卡特尔的形成。这是资本与生产的世界性积累的新的阶段，是先前是无法比拟的很高的阶段。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超垄断是如何形成的。”^④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列宁的世界性的积聚论当中，应该看到，刚才提到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积累的运行规律特别是作为集中的两大杆杠的竞争与信用，是在世界市场中再现了。

① 参考拙稿《世界市场论与资本主义》（日文）（林直道编著《现代资本主义论集》青木书店、1994年）。另外，《资本论》中除了这一资本积累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商业利润、利息、分配、土地费等）之外，第一部分第一篇《商品与货币》特别是同样的第一章“商品”的价值论、第三部分第二篇第九章《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与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的转化》、同第十章《竞争带来的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超余利润》的生产价格、市场价值论的商品的价值、价格论构成了其理论部分的筐架。

② 参考列宁的《关于所谓的市场问题》（《列宁全集》日本大月书店，1953年）。

③ 提出对于这种集中、积累的马克思的理解与恩格斯的解释之间的差异的，可以列举出野矢 Tetsuo、中川 Sumi、以及鹤田满彦的以下著作：野矢《〈资本论〉中的“积累”》（同文馆，1974年）、中川《资本的积累（下）》（参考林直道《法语版资本论的研究》大月书店，1975年）、同《蓄积、积累、集中的理论构造（I）（II）》（《高田短期大学纪要》7、8号，1989年3月，1990年3月）、同《积累、集中》（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经济学辞典 第三版》岩波书店，1992年）、同《关于列宁的“生产的积累”概念——与马克思的“积累”的概念的关联》（野口雄一郎等著《联合企业与现代产业、地域》御茶之水书房，1997年所收）、鹤田《〔资本的积累、集中〕概念的讨论》（富冢良三、服部文男、本间要一郎编《资本论体系 3》有斐阁，1985年，所收）。

④ 列宁“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列宁全集[22]》，1957年，第283页）。

在导致了这一世界性的积聚论的产生当中，“资本输出”、“国际卡特尔”、以及继此的“超垄断”、“事实上单一的包含全世界的托拉斯”、“积累所到达的阶段”、“世界金融资本”^①等等，是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帝国主义论的构造的特性的关键性的概念。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中还可以找到对于现代世界经济分析是必不可少的①世界性积累的世界性的聚集、集中、积累（基于聚集的积累、基于集中的积累）论、②“事实上单一的，包含全世界的托拉斯”的跨国公司论、以及③“世界金融资本”跨国银行论等等理论的论述。

那么，汽车行业的跨国公司和 IT 或 ICT 跨国公司又是如何的呢？它们果真能逃脱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性的集中、积累的运行规律吗？

（二）汽车跨国公司和世界性的集中、集聚运动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世纪转换期当中，跨国汽车产业不断经过跨国界的 M & A（跨国企业合并、收购）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性的合作）。

首先，1989 年 11 月跨越欧美的戴姆勒-奔驰对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的收购、即跨越大西洋的汽车跨国公司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公司的出现，宣告了汽车产业第一轮的世界性的集中、积聚运动的开始。

其次，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欧美汽车跨国公司对日本汽车产业的重组，是第二轮的世界性的集中、积聚运动的开展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其发展速度令欧美汽车生产国的企业家们震惊的丰田、日产、本田、三菱、松田以及其他的日本跨国汽车公司，在进入 90 年代特别是后半期之后，纷纷重组为松田—美国福特、日产—法国 Renault、三菱—德美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公司以及铃木、五菱、富士重工业—美国通用等。

第三，1997 年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的制约下所引起的包含银行、汇兑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汽车产业所进行的跨国界的 M & A（跨国企业合并、收购）以及同盟，完成了从德美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公司所开始形成的世界性的集中、积聚运动。韩国的汽车产业在这一世纪转换期开始了“旧 3 大”（现代汽车、起亚汽车、以及大宇汽车）的解体，一直到“新 3 大”（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德美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公司、法国 Renault—三星汽车、以及美国通用—大宇汽车）的重组的完成。^②

这一世界性的集中、积累运动有时候会强劲地快速地发展，有时候也会放慢速度，朝着集中化排除、分权化的方向发展。总之，绝对不是沿直线向前发展的。这是其历史性倾向的必然结果。

最后，列出以下图表，仅供参考：表 10 的美国通用（General Motors, GM）的世界性积聚（从业人员总数从 1995 年的 74.9 万人减半到 2001 年的 36.5 万人，而 GMNA 中心拥有 20.2 万人）、表 11 的美国福特汽车的世界性的积聚（从业人员总数从 1975 年的 41.6 万人减少到 2001 年的 35.4 万人，其减少率没有 GM 的多，在美国国内拥有 16.6 万的工作人员）、图 4 的德美戴姆勒-奔驰/克莱斯勒公司的世界性的积聚（从业人员总数从 1997 年的合并年的 42.5 万人减少到 2001 年的 37.2 万人，2001 年的生产总量为，在美国国内，轿车和商用车 173 万辆，

① “自由支配着数十亿资本、在世界各地拥有自己的‘分店’、代表、代理店、关系网等第。可想而知，要与这个事实上已经包含单一的整个世界的托拉斯展开竞争，是多么的困难”（前面已提到之书，第 286 页）、“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恶意，而是集中所达到的阶段驱使他们走上追求利润的道路”（同前书，第 292 页）、“各个大国与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变成了一般的体系，组成‘世界的瓜分’的诸关系整体中的一部分，然后转化成世界金融资本的各种活动的环节中的一环。”（同前书，第 305 页）。

② 参考拙稿《跨越国界的 M&A（企业合并、收购）以及同盟与汽车产业的世界性重组——世界性的集中、积累序说》（大阪市立大学证券研究中心《证券研究年报》第 15 号，2000 年 12 月）。另外，以下图表的数字是根据日刊汽车新闻社。（社）日本汽车会议所共同编著《汽车年鉴手册 2002—2003 年版》日刊汽车新闻社，2002 年。

比 1997 年的合并年的 180 万辆有所减少, 相反地, 在德国国内从 89 万辆增加到 120 万辆)、以及图 5 的丰田的世界性的积聚(国内生产总值从 1975 年的 242 万辆增加到 2002 年 3 月的 336 万辆, 国内从业人员也从 1975 年的 4.46 万人增加到 2000 年的 6.17 万人, 根据《世界投资 2000 年白皮书》, 该公司 2000 年的海外雇用职员人数已经达到了 8.83 万人)。

(三) (信息技术) 或 ICT (信息、通信、技术) 跨国公司与世界性的集中、集聚运动

电脑开发可以追溯到 1642 年的帕斯卡的机械式运算机、1673 年的莱布尼茨的加减乘除可能计算器、1833/37 年因《资本论》而出名的 Babbage 的阶差机械、1890 年的 Hollerith 的穿孔卡片机及在二战末期和战后开发的 ENIAC 电脑等等, 20 世纪 50 年代的“第二代电脑(半导体型)、继 20 世纪 60 年代的“第三代电脑(IC 型)”之后, 通过 1976/77 年的苹果电脑革命、1995 年的微软的 windows95 的开发、以及因特网的普及等等, IT 革命开始了。特别是太阳微系统所认为的那样, “网络即是电脑”(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 因特网的普及就是 IT 革命的开始。

但是, 在这里, 我们不得不想起“现代版”诠释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先是德语版的“……世界市场的网络(das Netze des Weltmarkts)——‘世界市场的网’或者‘世界市场网’当中, 编入了所有的国民, 从而, 资本主义体制的国际性的特性得到了发展”^①、接下来是法语版的“……世界市场的网络(le resea du march universel)中, 所有各个国家的国民的参与, 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深深烙上的国际性的特性, 得到了大规模的增大、发展”^②。这不就是与最近很流行的“无论何时何地的信息通信社会”相通的吗?^③

但是, IT 或 ICT (信息、通信、技术) 跨国公司的世界性的集中、积聚运动^④, 就象上面的表 3 显示的 1987 年-2001 年的交叉线境界的 M & G 那样, 第一位是英国电信(移动电话)的 Vodafone (M&A 件数共 28)、第四位是德国电信 (M&A 件数共 24)、第五位是德国电气通信工程的 Mannesmann (M&A 件数共 47)、第八位的英国电信 (M&A 件数共 47)、第十一位的美国 GE (M&A 件数共 228) 等等, 是和欧美跨国公司一起发展的。

美国国内是怎么样的呢? 硅谷的“空洞公司”, 被戏称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界的企业收购王”^⑤的 Silico 公司, 从 1993 年 9 月开始到 2001 年 7 月结束的 71 件^⑥的 R&D (研究、开发) 以至 R&A (研究、企业收购) 的例子、曾在 1993 年使面临崩溃的 IBM 复活的 CEO (最高经营责任者) Gerstner (他集中了压缩各项实业, 撤退削减了网络软件, DRAM 等) 在他任职中所进行的 IBM 对软件公司 Lotus 的敌对性的收购等 90 件^⑦的 M&A 的事例, 都表明了美国也在进行着激烈的集中、积聚运动。

1890 年世界上首次制定的美国的谢尔曼(Sherman)反托拉斯法(以下、美国禁止垄断法),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B (社会科学研究所监修, 新日本出版社, 1997 年), 第 1300 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法语版》(林直道编译, 大月书店, 1976 年), 第 198 页。

③ 前面的因特网, 是指 internetnetwork。另外, 所谓的 World Wide Web (全世界就象蜘蛛网一样张开的信息网), 也可以说成 World Wide Network, 因为 WWW 有三个 W 并列在一起。这样的话, 如果拥有个人电脑的所有国民都被编入或者是被纳入“世界市场的 Network”的话, 就有“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的发展”还有“被刻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性格大规模的发展壮大”。这才是“随时随地的信息通信”的“社会”吧。

④ 参考拙稿《IT 革命与 IT 跨国公司——世界性的集中、积累序说》(大阪市立大学证券研究中心, 前面提到之杂志, 第 17 号, 2002 年 12 月)。

⑤ J.S Young 《Cisco 的真实——Cisco 硅谷“超”优良企业的光与影》宫本喜一译, 2001 年, 第 91 页(原著 2001 年出版, P. 61)。

⑥ Paulson, ED, Inside Cisco: The Real Story of Sustained M & A Growth,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1, pp. 291—94。

⑦ Louis Gerstner 《巨象也跳舞》山冈洋一, 高远裕子译, 日本经济新闻社, 2002 年, 第 194 页以下(原著 2002 年出版, P. 142)

对这种集中、积聚规律具有相反的作用，这部法律后来成为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禁止垄断法的母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美国禁止垄断法在 1982 年对 IBM 以及 2001 年对微软的运用的案例，并思考一下这部法律是如何对这种集中、积聚规律起相反作用的。

第一，将要 IBM 提起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诉讼的美国司法部的首席经济师 R. T. DeLamarter，在其根据从 IBM 押收来的资料写成的著作^①中认为，IBM 是利用了“价格差”、“区分市场”等等违反竞争的手段，才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对 IBM 的这一诉讼，从 1964 年开始着手预备审查，到 1969 年 1 月的正式起诉，经过 13 年后的 1982 年 1 月，在美国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上台时，被认为是“没有起诉的必要”而以撤消诉讼的结局告终。

第二，对微软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诉讼^②，在美国共和党布什总统上台之后，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1998 年 5 月美国司法部与全美 20 个州同时起诉、1999 年 11 月华盛顿联邦地方法院认定其“垄断企业”的事实、2000 年 4 月地方法院作出违反禁止垄断法的判决、同年 6 月地方法院下了两个部门，即①基本软件（运行系统，OS）部门和②应用软件部门分割的命令，最后，01 年 6 月联邦高级法院作出撤消这个命令并将诉讼撤回地方法院的判决。这一判决之后，微软发表了《胜利宣言》。

综上所述，这种集中、积聚运动是作为国际的或国内的 M & A 以及相互的联盟而进行的，有时会由于 IT 或 ICT 企业相互间的胜者对败者的收购而强有力地加速发展，有时又会象 1982 年之前的 IBM 和 2001 年之前的微软那样，因为违反美国禁止垄断法而导致减速，有时则相反地朝地方分权（décentralisation）发展，因而绝对不是沿着直线前进的。积聚运动特别是世界性的集中、积聚运动只能是贯穿于整个发展史的。

我们已经详细地了解了理论，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T 以及 ICT 产业的现状。在这里，第一，我们将半导体产业分成 CPU（中央运算处理装置）和 DRAM（记忆存储所必要的随时输入与随时读出的记忆存储器）两个产业。第二，讨论电脑特别是世界的个人电脑的出口数量、以及 OS（基本软件）、也就是免费 OS 的芬兰的 Linux 与收费 OS 的美国微软的 Windows 之间的对抗。

首先，从 1971 年到 2001 年间，美国的 CPU 的处理能力不断的提高。自从 1971 年美国的英特尔在全球首次推出 micro process4004 以来，最近大约每 18 个月，CPU 的能力就增加数倍。其结果就出现了具有比好几十年前生产的电脑大数十倍的超强处理能力的超电脑和个人电脑。

再下来，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的实力，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如下的情况：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由于韩国三星电子、台湾南亚科技等韩国、台湾的半导体制造商的抬头，日本的半导体企业纷纷退出了 DRAM 领域。到 2003 年，NEC 与日立共同出资的日本唯一的半导体制造商——DRAM 生产公司 Elpidermemory 公司在接受半导体产业界的巨头美国英特尔公司出资的同时，以技术合作为方向，进入了最终的调整。

在 2002 全球共 16 亿 2000 万美元的 DRAM 市场中，各公司所占的比例为：第一位是韩国的三星电子（30.8%）、第二位是美国的微软技术（17.2%）、第三位是韩国高科技半导体（旧

① 参考 R. T. DeLamarter 的《Big Blue—IBM 是如何制约市场的》青木容一译，日本经济新闻社，1987 年（原著于 1986 年出版）。

② Sun Microsystems 的 CEO 的 S. Makliner 留下了如下的富有幽默措辞的名言：“关于微软——谁都不应该拥有每个人都使用的电脑语言。就象谁都不应该拥有英语一样”（K. Southwick《Sun Microsystems——全球高科技企业的痛快的管理》山崎理仁译，早川书房，2000 年，第 73 页，原著于 1999 年出版，P. 47）。这样，从在 1988 年 3 月登上美国上院公听会的舞台，经过多次猛击微软，到 1998 年 3 月以后司法部对微软的违反禁止垄断法的裁判的支持来看，似乎是在深入追查这个公司，然而，布什当选总统之后不久，联邦高级法院的判决决定了在美国国内的败诉。

现代半导体产业、13.0%)、第四位是德国的 **Infonion Technologie** 公司 (12.2%)、好不容易到第五位日本的 **Elpidermemoryg** 公司 (6.4%) 才出现, 步了三星、高科技等韩国半导体制造商的后尘。而排在第六位之后的有台湾南亚科技 (4.8%) 等其他厂家。

但是, 我们将目光从半导体产业移向电脑市场, 会发现这里已经确立了世界标准 (global.defect standard)。^①对此, IBM 的 CEO 的 **Louis Gerstner** 慨叹道: “IBM 的电脑领域中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问题是, 英特尔与微软掌握了电脑的硬件与软件的主干部分, 并且利用这个优势支配着价格。”^②

但是, 真正对这一世界标准“微软垄断”、特别是“美国 wintel(微软的 windows 加上 intel 复占)”开始产生恐惧的, 并不是美日的 IBM 和 NEC、富士通等旧电脑产业、也不是韩国、台湾、中国的三星电子、联想集团等新半导体、电脑公司, 而是马克思所讲的“所有的科学的劳动、所有的发现、所有的发明”、可以说是现代的“普遍性的劳动 (allgemeine Arbeit)”^③的芬兰的 **Linux**^④吧。

Linux 的免费 OS (基本软件) 公开设计信息, 呼吁全世界的参与。响应这一号召, 欧共体 (EU) 呼吁加盟各国对引进这一免费 OS 进行讨论, 中国也开始着力普及中国版的“红旗 **Linux**”。日本政府也要求在对有关电子政务的政府的提案中对这一免费 OS 的采用进行讨论, 并开始走上面向政府, 自治体的系统的引进之路。

四、结 语

2003 年 3 月 20 日, 美英不顾波及全球的历史上空前的反战和平舆论, 对伊拉克进行了非正义的武力攻击, 重演了与杀戮毫无两样的丑剧, 我们不能回避这件事情。

追随“现代的十字军骑士”、“西方剧的主人公”布什, 早早就表明支持战争的小泉首相、川口外相、“对小泉首相毅然的态度感到十分佩服”的冈本某氏 (《朝日新闻》3 月 21 日)、以及到头来只不过是美英攻击伊拉克辩护的“军事评论家”、伴随着战争而为股票市场的走向一喜一忧的“股东”们等等, 他们占据了日本的媒体, 昼夜不停地, 随时随地出现的嘴脸, 我们已经感到厌恶了。对此, 我更喜欢静静地听一下如下的理性的声音和报道。首先是哲学家鹤见俊辅氏的告戒: “世界上最崭新的文明对最古老的文明进行了攻击。这个最崭新的文明

① 微软的比尔·盖茨炫耀胜利般地说过, “有时, 政府或委员会为了推进 互补性会制定标准。这称作 ‘de jure’ 标准, 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 取得巨大的成功标准, 是 ‘de facto’ 标准——很多时候是市场发现的”、“de facto 标准是依靠市场, 而不是依靠法律建立起来的, 是由于正当的理由被选择的, 万一有更好的登场, 它就会遭被取代的命运——就象便于携带型(compact disk) 几乎完全取代了大型台式(analog disk) 那样”(比尔·盖茨《话说未来》西和彦译, Ascii 出版局, 1997 年第 99 页, 原著出版于 1996 年, P50)。

② Louis Gerstner, 前译著, 第 215 页, (原著, PP, 160--161)。

③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 A, (前提到之书), 第 179 页。

④关于 Linux 请参考 P. Wayner 的《为什么是 Linux? ——免费软件运动的挑战》(星睦译, Ascii 出版局, 2001 年, 原著出版于 2000 年) Pekka Himanen 的《Linux 革命——客家伦理与网络社会的精神》(安原和见, 山形浩生译, 河出书房新社, 2001 年, 原著出版于 2001 年)、Linus Torvalds 《因为那对我是兴趣盎然——席卷全世界的 Linux 革命》(风见润译, 2001 年, Sho-Pro Books 原著出版于 2001 年)。特别是 1973 年出生的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 Pekka Himanen 的《Linux 革命》一书, 由 Linux 的开发者 Linus Torvalds 作序, 由因《都市与 grass roots》(法政大学出版局, 1997 年)、《都市、信息、全球经济》(青木书店, 1999 年) 等而出名的社会学学者 M. Kasuteru 写的结尾, 要想了解 Linux, 此书可以说是必读之书。当中 Max Weber 的“新教徒的伦理” 比喻成“客家劳动伦理” 以及“电脑客家道路小史”, 也是颇有意思的。(付记——在本稿的校正中发现以下事情。4 月 15 日的 NHK 的节目 X《家电革命, Tron 的冲击》播放了比 Linux 更早的 1984 年, 日本的发明世界性的基本软件“Tron” 的坂村健集团的执着的信念和转折历程。认为“基本软件是信息化的基础, 就象水和空气一样, [所以, 谁也不能垄断]” 的坂村向全世界免费公开了“Tron” 的说明书。但是, 迫于美国的压力, 当时的通产省与家电业界屈服了。)

具备对地球上其他地方的所有生物（包括动物和草木）的破坏力。尽管美国的总统还没自觉认识到，但是他们应该考虑到对全人类谢罪，以及自身的末日的时刻已经到来”（登于《朝日新闻》3月24日晚报）。接下来，是国际法学者、名古屋大学松井芳郎教授的观点。他认为“对伊拉克的武力攻击，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警告“不要将国际法倒退回19世纪”（《新闻赤旗 周日版》3月30日号）。还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的作家 Geunter Grass 氏在向各国发送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认为‘不是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国家，大概就是给我们留下美好回忆的美利坚合众国吧”、“我十分感谢联邦首相施罗德和外交部长菲什坚毅的态度。他们顶住来自内外的敌视和中伤，一贯采取值得信赖的态度”（《朝日新闻》3月26日晚报）。支持小泉对美英攻击伊拉克的态度的冈本某氏与 Gras 氏的话差不多，但是他们之间的落差值得思考。在美国好莱坞的第75届学院奖颁奖典礼的台上，长篇纪录片奖获奖导演 Michael Moore 氏大喊道：“布什，知耻吧”，其勇气实在难得。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在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武力攻击的三周之前的2月27日，吉他演奏家藏人知有对美日首脑的批判。“如果我是日本的首相，我会对布什说‘要攻击伊拉克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去干吧！’”（《每日新闻》之“编织和平——伊拉克紧急”）。点缀满战争与革命的20世纪终于过去了，而在充满希望（本应如此的）21世纪初，看一看扛着资本特别是美国埃克森莫比尔公司（《全球投资白皮书2002年》，全球跨国公司第三位）、英国的英国石油公司（同第七位）等等“全球化”的亡灵，打着“中东民主化”的招牌，对伊拉克进行狂轰滥炸的美英联军，实在是不象话。之所以在开头说NHK（日本）3月30日的专题《地球市场》的第三集的最后解说员的台词具有象征意味，是想提醒读者：美国企图将无非是“新保守主义”、“布什主义”、“布什新帝国主义”的“美国型民主主义”、“美国型竞争主义”推销到全世界。读者们！在这个“战争期间”，切莫随随便便地看电视之类的东西。“产生少数的胜者和大量的失败者的美国竞争主义，现在正在企图波及全球市场”

编者注：这篇文章附有大量的表格，因本刊每期的篇幅有限，只好删去。读者若需了解表格所提供的信息，请查阅原文——刊载于日本《经济》月刊2003年7月号上，或与译者联系索取。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邮 编：361005